

習近平執政與共黨體制權力 收放循環模式*

賴潤瑤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蔡文軒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摘 要

爲何習近平主政下的中國，在外交上呈現出對西方抗衡，在經濟上則重新擁抱社會主義與強化國有制的政策？本文比較中共與蘇共的政治發展，提出政治集權—分權的循環模式，認爲共黨體制意識形態的爭鬥，使得黨內可能出現保守或改革的政策之爭。當保守路線成爲主流時，政權容易走向統制經濟與偏離國際建制的路線。這些政策，需要最高領導人強化集權來貫徹之。惟一旦上述政策導致國力與經濟衰退，則又必須要偏離統制經濟與走向國際建制來進行相關改革，在這個階段，領導人通常會以政治分權的方式來進行。習近平與布里茲涅夫時期類似，都處於政治集權的階段。本文希望從共黨體制的特性來提出結構性解釋，說明爲何習近平主政下的中國會走向「再毛化」路徑。

關鍵詞：比較共產主義、政治集權、統制經濟、國際建制、威權政體

* 作者感謝兩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此外，還要感謝研究助理郭淨源與周睿淵（Andrei Dagaev）的協助，特別是對於本文第貳部分在相關統計數據的整理與呈現。然本文的文責，由作者自負。

壹、前言

2012年習近平擔任總書記，隨即提出「中國夢」的願景，並且強調中國要堅持社會主義的道路，展現自身制度的優越性。習近平透過制度的建立來進行集權，強化其在政治上的權威（Tsai & Wang, 2024: 27-45）。習時期的中國，除了對於國內採取高壓的統治政策，在外交上也呈現出強勢的作為，與菲律賓、越南等國在南海發生衝突，並且對臺灣立場也日漸強硬。然而，近年來，中國的經濟成長速度趨緩、國有企業改革有限、地方政府債務大幅上升等現象，都是習近平時期重要的經濟挑戰。

如何解釋習近平時期中國走向集權與發展上的停滯？習近平個人崇尚社會主義與毛澤東路線，是文獻的重要觀點之一（Torigian, 2018: 7-15; Lee, 2018: 473-497）。當然，這種個人因素的解釋，確實可以生動地掌握住習近平的個性或生涯經驗，對於他在執政風格上的影響。但本文希望能就政治體制或結構等因素提出另一種觀點，作為補充。我們認為，現今習近平的集權現象，很可能是共黨政權發展階段中的一種過程。簡言之，共黨體制因為意識形態與信念等因素，使得其政權常常出現保守與改革政策之爭。一旦保守路線成為主流，共黨政權的最高領導人往往走向政治集權，而相關政策則包括偏向統制經濟（command economy）與偏離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在改革路線成為主軸時，最高領導人往往採取分權的做法，而偏離統制經濟與走向國際建制。換言之，共黨政權走向集權一分權的收放循環，也是我們所稱的政治結構因素，可以用來說明現今習近平時代，中國正走向政治集權的階段。

無獨有偶，蘇聯的發展道路是一個可以用來與中國作比對的案例。蘇共領導人史達林（Joseph Stalin）在1922年至1952年間，進行長達30年的政治集權與恐怖統治。繼任者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在1953年開始逐步進行政經改革與緩和對西方的

關係，這被世人稱為「赫魯雪夫解凍」（Хрущё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Khrushchev Thaw）。然而1964年，蘇聯軍官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在莫斯科發動政變，取代赫魯雪夫的執政地位，在長達18年的主政期間（1964-1982），蘇聯在計畫經濟下成長幅度下降、政治改革停滯、領導高層老齡化，政治學界稱之為布里茲涅夫的「停滯時期」（Период застоя; Period of Stagnation）（陸南泉，2001：64-73）。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執政後所提出的「新思維」（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New Thinking），又將蘇共體制再度導向分權的階段，對內實施政經改革，對外則緩和與西方國家的關係。當然，歷史的發展過程可能更為複雜，我們很難說赫魯雪夫或布里茲涅夫時期的蘇聯政治，一定是趨向於分權或集權。更合理的說法是，即便在赫魯雪夫或布里茲涅夫時期的政治發展，也呈現出集權和分權程度的改變。我們將在第貳部分的圖1來作討論。

蘇聯的路線與經驗，無論成功或失敗，常被中國視為是重要的參考範例。布里茲涅夫的「停滯時期」一詞，在鄧小平主政時期，已經在中國知識分子之間引起熱烈討論，當時學者多數認為中國共產黨應該記取蘇聯改革停滯、進而走向崩潰解體的教訓，繼續深化經濟改革（Li, 2018: 163-199）。但時至今日，中國的政經與外交政策，似乎與布里茲涅夫時期若合符節。本文所指的「停滯時期」，指的是經濟政策走向統制經濟，以及外交政策偏離以西方為主的國際建制。本文認為蘇共與中共在政治發展的階段，都呈現出政治集權一分權的收放循環，此將在之後的內容清楚提出本文的觀點，並解釋為何共黨體制會出現這種現象，並預期習近平與後習近平的政治發展，可能朝向什麼樣的腳本（scenario）來變遷。

此外，本文希望進一步發展和修正比較共黨的理論。學界普遍認為隨著國家發展的需要，共黨政權的烏托邦色彩會逐漸削弱，取之而來的是現代化的路線（Jowitt, 1975: 69-96）。但本文認為以蘇共和中共的個案來看，上述觀點可能是一個過於樂觀的期待。確實，共黨

政權在一定時期確實會進行政經改革與外交的「低盪」（*Détente*）。但從政治集權一分權的模型而言，共黨政權可能在下一個階段又重新回到集權與外交對抗的路線，正如現今習近平的中國。換言之，共黨政權的發展階段，恐怕不是烏托邦走向現代化的線性模式，而更可能呈現出集權一分權的收放循環。

本文的安排如下：第貳部分針對目前比較共產主義理論及威權統治文獻進行梳理，進而聚焦於集權一分權模型，對於中、蘇政治發展提出分析架構；第參部分提出權力收放循環的過程與機制；第肆部分與第伍部分分別討論中國的三次權力收放循環的歷史；最後，本文對於習近平為何走向「再毛化」，¹提出更為結構性的解釋，來補充文獻的不足。

貳、共黨體制的集權一分權模型：中蘇政治發展

中共政治發展的軌跡與前景具有一定的重要性，除了比較威權等文獻的討論，近年來有學者提出喚回比較共產主義的呼聲。例如吳玉山認為，相較於威權體制的特徵，當代中國的政治制度更接近列寧式黨國體制，因此比較共黨主義的分析框架，是處於中國區域研究與比較威權研究之間的一個中間階層（*meso-level*）研究路徑（吳玉山，2021：1-31）。確實，中共自1921年建黨後，效仿蘇聯體制來建立黨組織。在1949年建國之後，大量學習蘇聯的各種制度，直至1950年代末（Bernstein & Li, 2010: 1-24）。兩國的制度或地理條件，有極大的可比較性，易言之，蘇共的發展路徑與軌跡，很適合吾人用來

1. 本文所指的「再毛化」，主要是指政治走向集權，而經濟偏向「國進民退」的類型。習近平的治理型態雖然有毛澤東時期的色彩，但毛與習時期還是有所不同。例如在習時期，中國已經難以完全走向毛時期的國有經濟，社會治理並不趨向毛澤東主張的反智主義，以及外交戰略上無法再走向不計成本的革命外交。

比較甚至預測中共未來的政治走向。²此外，中國與蘇聯相似的另一個特徵，是其廣土眾民的地理條件，使其更有潛力與美國抗衡。因此，本文於此部分以中、蘇為個案進行討論。³

共黨體制的核心，在於黨組織對國家與社會的全面控管。黨組織的運作基礎，是所謂「民主集中制」。但由上制下的集中制，卻成爲了共黨體制政治運作的主要特徵（Kornai, 1992: 34-35），而斷喪「民主」的意涵。各級領導機構中，以黨中央，也就是政治局與其常委會爲最重要領導機構。政治局排名第一的幹部往往被視爲是最高領導人，他們通常擔任黨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或「主席」等職務。⁴但是，由於共黨體制欠缺實質的監督與制衡機制，這使得有政治野心的最高領導人往往可以破壞共識或制度，而造成個人獨裁的現象，例如現任總書記習近平就是典型的例子（Fewsmith, 2021: 265-282）。

從蘇共與中共的發展軌跡來看，權力集中或分散似乎呈現出一個有規則的循環。此處所指的權力集中，主要是共黨的最高領導人集權於一身，而沒有意願與其他高級幹部進行權力的分享（power sharing）。在此，借用比較威權學者斯沃利克（Milan W. Svobik）的觀點，他認爲權力分享的問題，是獨裁者在面對政權存續上的一個挑戰。爲了拉攏其他幹部的支持，獨裁者必須對他們分享權力，但這

-
- 寇健文以最高領導人主要權力來源改變，對於中共和蘇共高層政治的演變進行分析。他認爲中共在鄧小平到胡錦濤時期出現了政治堆積的情形，蘇共則逐漸呈現出制度耗散的現象（寇健文，2007：93-141）。
 - 在國際政治體系下，中小型社會主義國家即便進入政治高度集權的階段，也未必選擇與西方國家對立的外交方針，其對外政策仍可能保持務實與彈性。
 - 在具體的運作上，掌握軍事領導權力往往才是共黨體制的真正最高領導人。一般情形，總書記會兼任中央軍委主席，但也有例外。例如 1980 年代的中國，軍委主席是鄧小平，因此他被視爲最高領導人，而同時期的總書記，包括胡耀邦與趙紫陽，並不算是真正意義下的最高領導人。

種做法的後果卻可能威脅到獨裁者的執政地位（Svolik, 2012: 2），形成了一種獨裁者困境（dictator's dilemma）（Wintrobe, 1988: 20-40），也就是最高領導人可能會在集權與分權當中，進行收放的循環。

從中共與蘇共的歷史發展，其政治權力之集權一分權的循環，有其相似性（請見圖 1）。在蘇聯與中共體制中，都強調「集體領導」和「黨內民主」的重要性。當然，這兩個組織原則不一定都恆常地落實，但我們可以預期的是，如果官方媒體提到上述兩個概念的次數增加，則意味權力分散的程度也增加，反之亦然。

圖 1 在蘇聯的數據上，主要是來源於東景資訊服務（East View Information Service）資料庫，此資料庫包括「真理報數位檔案館」（Pravda Digital Archive），筆者對於 1950 年至 1991 年的《真理報》（*Правда*; *Pravda*）進行了分析，查找了 15,282 份《真理報》。由於此資料庫的介面不提供線上搜尋關鍵字的功能，為了尋找關鍵字，筆者先下載數位檔案，再以關鍵字的方式在該檔案來查找，包括「集體領導」（коллективн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及「黨內民主」（внутрипартий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都是透過這個方法在《真理報》中蒐集其出現次數。由於俄文的語文概念和中文不盡相同，因此除了集體領導與黨內民主，筆者還搜尋相近意思的概念，諸如「領導的集體性」（коллективность руководства）、「領導裡的集體性」（коллективность в руководстве）及「黨內生活的民主性」（демократичность внутрипартийной жизни）。至於中國大陸的資料取得則較為簡易，係透過人民網電子版的關鍵字介面搜尋，取得「集體領導」與「黨內民主」在文章所出現的數量。上述相關數據，請見文末的附錄一與附錄二。

又就圖 1 曲線反映觀測資料的趨勢來看，曲線呈現虛線，代表關鍵字的數量增加，意味著分權程度增高；若曲線為實線，則代表關鍵字的數量減少，政治權力有走向集中的趨勢。圖 1 的曲線是透過局部散點平滑估計（Locally Estimated Scatterplot Smoothing,

LOESS) 計算出對於觀測值之間的關係，不同於普通的迴歸分析以全部觀測資料計算迴歸線，局部散點平滑估計採用局部多項式迴歸 (Local Polynomial Regression)，將資料分成數個小區間，並在每個區間內對於每個觀測值加權後，再進行最小平方差的計算 (Gijbels & Prosdociami, 2010: 590-599)。如此計算出的迴歸線可更加貼近觀測資料，其結果可以檢視觀測資料的關係。本文是使用 R 程式語言 ggplot2 的 geom_smooth 功能來繪製該圖的曲線 (Cleveland et al., 2017: 309-3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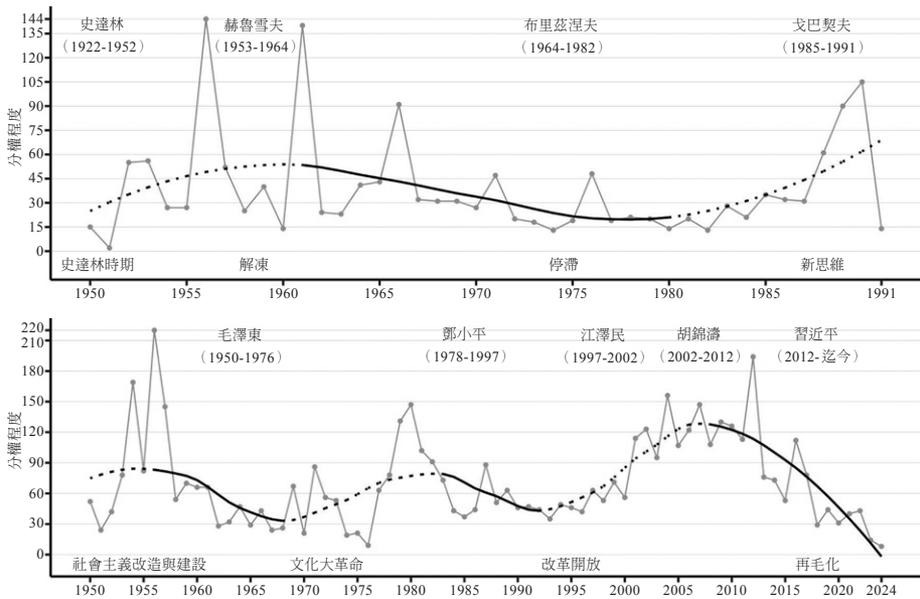


圖 1 政治集權—分權循環的模式

從圖 1 可以看到，赫魯雪夫在 1953 年執政後，為了解決史達林時期的政治集權，開啓分權政策。在 1953 年之後，「解冻」的現象開始出現。赫魯雪夫接班後，他對於史達林時期的政治集權現象提出批評。在 1956 年的蘇共二十大上，赫魯雪夫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

其後果」的祕密報告，提出要反對於個人迷信與個人專斷的現象，甚至在 1961 年，希望將蘇共建立成一個「全民黨」。相較於傳統的列寧式政黨，全民黨強調社會主義建設已經基本完成，蘇共的特徵不再是反映階級性與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必須作為以全民為基礎的政黨。赫魯雪夫在 1961 年的蘇共二十二大上，將「集體領導制」寫入黨章，並明定之後的黨代表大會、中央全會、主席團會議，都要如期召開。此外，重要幹部也出現了任期制度，廢除了蘇共建立以來所慣行的終身制（許明，2002：191-198）。

在布里茲涅夫時期，蘇共的政治體制重新走向集權型態，蘇共高層在布里茲涅夫時期進入到「停滯」的時代。布里茲涅夫以「穩定幹部政策」的名義，終止了幹部任期制的實施。在經濟發展上，重新回到史達林時期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經濟的舊路（鄭易平，2016：257-258），並在外交上與美國為主的西方陣營激烈爭鬥。在布里茲涅夫過世之後，⁵蘇聯政治又走向分權的路徑。戈巴契夫提出「新思維」的執政路線，引進一些西方民主與經濟體制，例如，戈巴契夫強調提拔新人的重要性，在 1985 年的蘇共二十七大大上，重要幹部作了大規模的改選，許多年輕幹部進入到中央政治局與書記處。但過於「激烈」的體制改革，似乎也弱化了蘇共的政治穩定性（丁篤本，1999：258-274）。最後，蘇聯在 1991 年走向解體。

中共的發展歷程與蘇聯相比較，有其類似性。由圖 1 可見，中共在 1950 年至 1956 年間是趨向於分權，在這之後，由於反右與大躍進等政策開始逐步集權，一直到文革中期。1970 年左右，中共中央呈現出四人幫與周恩來的權力平衡現象，因此又開始走向分權的

5. 蘇聯在 1982 年至 1985 年間還有兩位最高領導人，包括安德洛波夫（Yuri Andropov）與契爾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但這兩位的任職時間不長，比較像是一個政治過渡的時期，宛如中國的華國鋒，因此上述領導人並未在圖 1 予以呈現。

路徑。文革之後，中共開始了改革開放路線，⁶但「集權一分權」的循環現象仍然不變。集權的做法在 1983 年之後又重新復辟，包括 1983 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與 1986 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運動，讓中共又開始走向意識形態治國。1989 年的六四事件，可以視為是民眾與幹部對於這種左傾路線的一種抗爭。在鄧小平於 1992 年南巡後，中共重新走向分權的路徑，延續到胡溫時期。而習近平於 2012 年末之後執政，基本上將收權的現象繼續強化，延續迄今。自習近平上臺後，許多學者觀察到中國改革路線的終止（Minzner, 2018: 17-36）。其政治集權化的情形又重新出現，吳玉山將這個現象稱之為「再毛化」（吳玉山，2023：4）。

本文在圖 1 希望呈現出蘇共與中共確實都出現了政治集權與分權的循環，而如何解釋列寧體制國家有這種收放的權力循環，本文認為這與其政權本質及其所引領的外交和經濟發展路線有很大的關係，相關論點將於下一部分闡述。

參、過程追蹤與機制

一、過程追蹤：權力型態、經濟與外交

如何解釋圖 1 的政治權力收放循環？其過程追蹤（process tracing）與機制為何？首先，我們要指出許多學者發現共黨體制出現某項政經權力的收放循環。例如，吳玉山從派系政治的角度，分析 1980 年代的中國經濟投資量的循環，他認為這個現象與市場改革派和官僚改革派的政策鬥爭有關（吳玉山，1996：51-95）。陶儀芬則認為，中國政府的投資量會在黨代表大會召開之前增加，呈現出類似像是西方的政治經濟景氣循環（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PBC）（陶

6. 在中共政治的討論中，華國鋒雖然在文革之後短暫執政（1976-1981），但他的權力基礎並不穩定。華國鋒時期更常被認為是一個從毛時期到鄧時期的過渡階段。因此，本文並不對華的執政歷史進行討論。

儀芬，2007：177-210）。政治集權與分權，可能會影響到經濟與外交的運作，本文將過程追蹤的梗概整理於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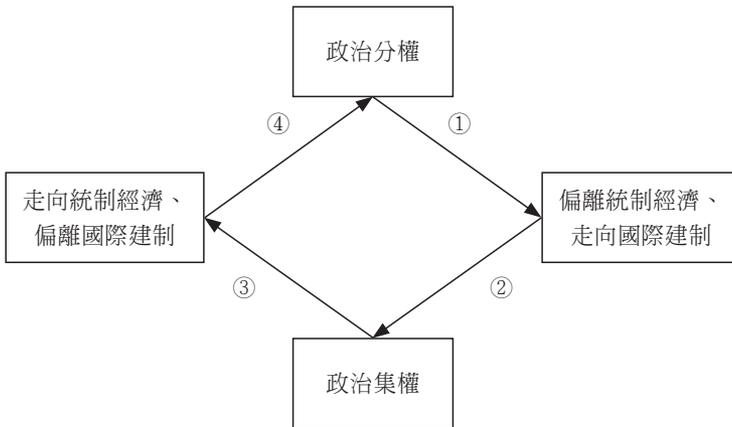


圖 2 中共體制的集權—分權與過程追蹤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說明：該圖的數字代表時序性的過程順序，將在內文作詳細說明。

從圖 2 可以看到，政治的集權或分權所導致的結果，將影響經濟與外交的運作。本文提出兩個概念進行分析，分別是統制經濟與國際建制，認為中共在政治分權的狀況，將導致政權偏離統制經濟及外交走向國際建制；在政治集權的情境下，則會讓政權走向統制經濟及外交偏離國際建制。

首先說明上述兩個概念的定義，統制經濟指的是國家對於市場的監管與控制，蘇聯、中國、東歐各國在冷戰初期，皆採取了統制經濟的制度，由政府掌握生產工具的所有權與產業結構的控制權。此外，國家能夠針對國內資源分配、生產體系、產品消費事先進行集中規劃，但這種經濟模式忽視市場機制。在共黨國家，經濟路線的推動與國內政治息息相關。吳玉山對中國、蘇聯、波蘭三國作出比較，分析改革派與保守派的鬥爭如何影響經濟路線的制定（吳玉山，1996：

1-95；蔣永清，2015）。

社會主義國家在統制經濟的理念，也影響了建國之後的政經路線發展，這種思維限制了市場化與現代化的引進。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在 1980 年代初期保守與改革派的爭執中，逐漸推動改革開放。鄧小平是改革派的代表，他採取更多市場化的策略並推動產權改革，以此促進經濟發展（Fewsmith, 1994: 87-122）。爲了避免改革幅度過大所帶來的風險，中國採取了「漸進式改革」路徑，逐步將統制經濟進行改造，轉換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模式（吳玉山，2003：1-30）。但事實上，中共黨內對於統制經濟成分多寡的爭論，一直持續迄今。

另一個概念是國際建制，在本文的定義中，國際建制主要是指由大國之間所建構的一套制度或理念，用於國際社會以達成各國間的合作與利益最大化（Keohane, 2005: 49-84; Snidal, 1985: 579-614; 邱奕宏，2021：127-184）。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研究指出，國際組織的成立有助於國家之間的合作與政策協調，國際制度則提供國家成員彼此溝通意見的平臺，同時也能夠將規範（norms）、法則（rules）、理念（ideas）內化成爲自身的行爲準則（Krasner, 1983: 1-22; 袁易，2018：62-75）。換言之，國際建制是國與國之間互動方式的展現，包括國際組織、區域組織、國際秩序等不同層次。其運作的基石，可能是正式制度，也可能是理念或共識等非正式規範。

在我們定義何謂走向或偏離國際建制時，主要是指中國是否願意遵守國際社會的相關規範或制度。近年來國際建制的重要理念是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這是主權國家參與國際或區域組織普遍接受的行爲準則，各國皆遵守開放、平等、對話的原則，以協調彼此的關係（Ruggie, 1993: 3-48）。例如，中國於 1994 年以東協協商夥伴國的身分參與東協經濟論壇，是中國在冷戰結束後首次參與區域多邊安全對話，此反映中國支持亞洲各國所建立的國際建制（Shambaugh, 2005: 64-99）。但在本文當中，我們對國際建制的定義更傾向是以

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所建立的一套制度或共識。在此必須強調，中國走向國際建制，並不一定意味著中國與其他國家沒有衝突或戰爭。比較合宜的說法應該是，中國有意融入國際建制來與他國合作，但彼此之間的矛盾仍然可能持續存在。

由圖 2 呈現的過程追蹤，結合圖 1 中共三次的政治權力分散與集中循環，本文將相關的代表性歷史事件整理於表 1。中共的三次權力分散與集中的週期，分別是 1950 年至 1970 年、1970 年至 1992 年及 1992 年迄今。在表 1 的部分，尚有列舉該時期重要的經濟與外交政策。

表 1 中共高層集權與分權的循環

領導人	年分	重大的經濟與外交事件	過程追蹤	集權 / 分權的週期
毛澤東	1950-1956	新民主主義建設； 一面倒、華沙會談管道	①→②	第一次
	1956-1970	大躍進；三個世界	③→④	
鄧小平	1970-1982	文革後期的四三方案、改革開放； 低盪政策	①→②	第二次
	1983-1992	反資產自由化運動； 不結盟的外交政策	③→④	
	1992-1997	南巡講話；江澤民訪美		
江澤民	1997-2002	三個代表；美中的反恐合作	①→②	第三次
胡錦濤	2002-2012	科學發展觀； 六方會談、中美戰略經濟對話		
習近平	2012-2025	再毛化、* 國進民退；** 美中抗爭、戰狼外交	③→④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說明：1.「*」習近平時期的再毛化，以政治集權最為明顯。習近平成立了諸多跨系統的大型領導小組，並擔任組長，以便集中相關權力與資源來處理自己所偏好的政策。此外，這種決策方式架空了政治局及其常委會，以及國務院的職能。特別是在習近平第一屆與第二屆任期上，其領導小組的決策模式，使得李克強幾乎成為有名無實的國務院總理（黃信豪，2023：5-46）。

2.「**」中國政府扶植國有企業，給予更多貸款與補貼的優位待遇，進而擠壓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

二、機制：意識形態與路線鬥爭

再來，本文將解釋為何會出現政治上的集權與分權的循環？其背後的機制為何？簡言之，意識形態導致的派系鬥爭可能是一個可以觀察的議題。在中共與前蘇聯的政治體制中，意識形態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不僅提供了政權合法性的來源，同時也指引這兩個國家對於國際秩序與經濟改革的走向（Schurmann, 2022: 17-57; Janos, 1996: 1-24）。在共黨主義的理念中，西方的自由主義是必須揚棄的思想。馬克思與恩格斯所著的《共產黨宣言》指出，只有不斷推進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將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任劍濤，2012：13-29）。共黨政權希望與西方自由主義國家爭奪世界觀的控制權及話語權，這是一般威權國家所沒有的現象。諸如南美許多政權在 1960 年代所建立的官僚威權主義（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雖由軍人、專業官僚負責制定經濟政策（Linz, 2000: 49-64; O'Donnell, 2023: 1-71），但這些威權國家在意識形態上並沒有與西方自由主義對抗的理念，甚至可以與美國等西方大國長期和平相處。

在意識形態的研究上，近年來似乎有逐漸復甦的現象。政治學界逐漸重視國家領導人世界觀（world view）的重要性，研究者藉由閱讀領導人的書信往來、演講、官方文獻，能夠展現出理念（ideas）因素如何形塑國家重大政策改革與外交行爲（Legro, 2007: 515-534）。傅若詩（Rosemary Foot）與金艾美（Amy King）認為習近平的世界觀有三大特色：以國家為主導（state-led）的發展主義、國家主權平等、整體國家安全（comprehensive national security）。這些因素，為比較習近平與布里茲涅夫主政時期的外交與經濟政策提供了具體的背景知識（Foot & King, 2020: 210-227; Wang, 2019: 15-30）。藉由理解習的世界觀，能夠對於中國大戰略與區域外交的走向有更精確的認識。

意識形態對於國內政治而言，往往形成保守與改革路線的鬥

爭，進而導致政治集權或分權的循環。共黨意識形態與西方世界的不容體現在經濟集體化和外交對抗，經濟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各國面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選擇。蘇聯實施了高度集權的體制，由國家主導工業化的進程與農業集體化，動用國家資源與西方世界進行全方位的對抗（Kornai, 1992: 33-60）；外交方面則形成了以美蘇為主的冷戰集團。對於中國來說，保守與改革的路線鬥爭，影響了國內與國際政治的發展。舉例來說，中國在1950年至1956年間，政治相對分權，經濟偏離統制經濟且外交走向以蘇聯所建構的國際建制。當時正值美蘇兩大集團對抗時期，中國走向以蘇聯為首的一邊倒政策。在1956年之後，隨著保守政策的崛起，毛澤東逐漸認為中國應該與美蘇之間保持距離，並提出「三個世界」戰略理論，認為中國應該聯合亞非與拉美等第三世界國家（段春義，2018）。

再以表1為例，我們可以看到後冷戰時期，中國在1992年之後逐漸將改革路線再度推向議程。江澤民基本上承襲鄧小平的理念，並認為世界局勢朝向「多極化」發展。江主政時期，中國積極加入國際組織，在支持各式國際建制時，也提倡「多極化」的發展，增加自身影響力（Jia, 2005: 395-407）。簡言之，中國在1990年代到2000年初期，經歷了軍事現代化與經濟快速成長的過程，作為一個快速崛起的區域強權，中國政府必須向西方國家與周邊國家清楚表明其是維護區域秩序與世界和平的穩定力量（Zheng, 2005: 18-24）。在這段期間，中國加速了市場化經濟的推展，也逐漸融入了國際建制，此與當時中國所推動的改革路線有關。在這個氛圍下，中國的政治權力相對分散，而集體協商的體制也有助於這些相對「開明」政策的實施。

中國內部的權力結構集中與分散的循環，係意識形態所導致的保守與改革路線之鬥爭，而集權或分權的政治型態，則深刻影響經濟改革與外交政策。表1呈現的三次政治權力收放循環，其背後都與意識形態有關。在習近平執政後，其勇於「鬥爭」的意識形態與毛澤東有

類似之處。毛採用大規模群眾動員方式，進行國內階級清洗並清除反動右派人士；習則認為鬥爭是一種勇於面對挑戰、對於社會主義信念奉獻的精神（Torigian, 2022: 307-338）。

肆、毛到胡時期的權力收放循環

一、第一次循環

蘇聯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在經歷過與西方意識形態對立之後，國家總體能力均有所削弱，因此在這段時期主政的領導人，皆會採取改革開放與權力下放的政策（Mitter, 2024: 366-373）。1949年中共建政時期，毛澤東採取開明態度，廣納國內各式政治與經濟想法與願景，展現出第一次權力循環中分權的過程（圖2 ①→②）。毛澤東在經濟政策上偏離統制經濟，而推行「新民主主義」政策作為中國過渡到社會主義之前的經濟指導方針（羅平漢，2020）。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在於有限度地節制資本，政府只針對關係到國民生計的產業加以管理而已（張神根，2022）。中共取得政權初期，在外交政策上也採取開放溝通的態度，從1958年開始到文革之前，中美雙方在波蘭華沙舉行了多次大使級會談，成為兩國保持交往接觸的管道，且過程中沒有展現過多意識形態與政治理念上的衝突（Goldstein, 2001: 200-237）。

另一個影響是在中國傾向走向國際建制，特別是以蘇聯為首，在1950年至1956年之間所建構的體系與理念，是當代國際秩序的重要元素，相對於和平時期，通常依靠霸權國家或一些區域強國共同維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蘇兩大陣營隨即開始冷戰對抗，當時毛澤東對於國際局勢與中國戰略的看法，主要著眼於推動社會主義的建設與鞏固人民對共產黨的支持（秦華，2011）。由於毛澤東的世界觀帶有革命性質，因此他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終將爆發，這種對於戰爭即將到來的急迫感，讓中國共產黨認為亞洲秩序仍然動盪，並且

需要隨時準備再次和美國對抗（高朗，2006：53-94），因此在建國之初的一段時間，中國以蘇聯為師，包括參與其建構的國際建制。

在大躍進時期，毛澤東開始強化政治集權。這時的過程追蹤，呈現出圖 2 ③→④的階段。中共推行了更極端的統制經濟政策，導致全國嚴重的大饑荒。經濟集體化政策的實行，同時加劇了共產黨內的派系鬥爭，主張追求高速經濟成長的激進派與追求穩定的改革派之間持續爭辯不休。直到文革後期，由改革派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掌握經濟政策，才逐漸恢復生產效率（吳玉山，1996：51-54）。而在這段期間，毛澤東的「三個世界」戰略逐漸形成，他強調中國要擺脫對於美蘇的依賴。中國對於以這些大國推動的國際建制持保留的態度，但我們不能說中國在這段期間完全不參與任何國際活動或組織，而是在理念上，對於融入國際建制抱持著保留的觀點。

二、第二次循環

第二次的權力收放循環在 1970 年代開始展開。文革後期中共經歷了第二次權力循環中分權的過程（圖 2 ①→②），在經歷過一連串政治鬥爭與群眾運動後，中國內部民生凋敝、經濟實力大幅衰弱。在 1970 年代初期，中國在產業政策上作出重大轉變，開始向歐美國家大規模引進成套技術設備，例如引進美國、德國的工業生產技術，並且在化工、冶金、鋼鐵領域派出政府官員出國考察，通稱「四三方案」（王駿，2020）。冷戰高峰時期，共產主義國家領導人為了更有效率地運用經濟與軍事資源，需要將政治權力集中，因此國有化政策是合乎理性的政策選擇。然而在低盪時期，兩大陣營的對抗不再如此劇烈，共產主義國家能夠逐漸進行經濟改革，並將政治權力逐漸分散，允許農村改革與有限度的產權私有化（Chen, 1995: 97-130; 朱蓓蓓，2000：79-111）。

在鄧小平領導下，中國政府自 1978 年開始推行了一連串經濟開放政策。在這個過程中，政治權力趨向分散。舉例來說，中共高層在

政治局委員與文官任用上，採取「首長負責、分工辦事」的權力下放運作方式（寇健文，2010：187-258）。對此，鄧在1980年的談話就清楚指出，「權力不宜過分集中，權力過分集中，妨礙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實行，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鄧小平，1994：321）。

1978年鄧小平開始推動改革開放政策，擱置了毛澤東時期階級鬥爭與群眾革命的路線，並對於國際建制抱持開放的態度（楊勝群，2019）。這項對外政策轉向，主要源自於鄧小平在國內推行改革開放所驅動，為確保經濟體制改革能夠取得具體的成果，共產黨的政治體制也必須有所調整，然而這一切的制度轉型皆需要穩定的國際環境與區域秩序作為基礎（鄧小平，2009：164）。因此，他認為世界戰爭爆發的可能性低，中國要積極維護和平並且把握這個戰略機遇，集中國家資源投入經濟發展，以實現國家現代化的長遠目標。

然而，1983年起至1992年間，中共開始集權，過程追蹤呈現出圖2 ③→④的階段，中共內部就市場改革與西方資本主義影響掀起一系列路線鬥爭（朱蓓蕾，2000：79-111）。鄧小平陸續在1983年底發起「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嚴格審查有自由主義、人道主義傾向的文藝作品與新聞報導（夏春濤，2014：23-29）。在1986年，鄧主導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運動，採取嚴厲手段消除西方資本主義的精神污染，並使用紀律的手段以維持社會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的體制（李強，2012）。共黨政權在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競爭時，國內政治菁英要採取何種方式推動社會主義建設（國有化 v.s. 私有化）（Shirk, 1993: 107-148; 李福鐘，2022：45-93），即「姓資」或「姓社」兩種路線的選擇，一直是中國共產黨內開放派與保守派長久的爭辯焦點。即便鄧小平在天安門學生運動之後堅持改革開放路線，仍然面對黨內的質疑與挑戰（Chen, 1999: 447-467）。

在外交上，這段時期則似有偏離國際建制的現象。雖然1980年代初期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並提出「和平與發展」是其外交理念，

強調需要創造和平的國際環境以利現代化建設，但在 1983 年至 1992 年間，鄧小平主政時期的外交路線，主要呈現以下三個方向：首先，中共堅持「獨立自主」與「不結盟」的外交方針，強調不附和任何國際同盟體系。這種強調自主、不結盟的立場，和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建制理念存在一定的距離；其次，在經濟政策上，鄧小平提出「自力更生」的重要原則，主張中國的發展應以自身力量為基礎，而非依賴於國際市場或西方主導的經濟體系（華思齊，2021）。隨著 1980 年代中蘇關係逐漸緩和，鄧小平進一步提出：「需要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與政治新秩序，兩者是要同時做，以相互適應」（高屹，2013）。這一思維反映出中國對當時國際建制持保留的態度，並希望塑造有利於自身利益的新規則。總體而言，儘管中國在 1983 年至 1992 年間積極推動改革開放，但在外交政策上，仍展現出對以美國為主導之國際建制的保留與偏離。

三、第三次循環

第三次權力收放循環，係從 1992 年開始迄今。在表 1 可見，分權過程（圖 2 ①→②）開始於鄧小平在 1992 年的南巡，一直到習近平掌權為止。鄧在巡視深圳時發表重大談話，堅持推進中國改革開放道路，提高人民生產力與生活福祉。鄧小平強調，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鄧小平，2009：375）。隨著江澤民主席繼任，他也承襲了前者的路線。

1990 年代末期，江澤民在維持民主集中制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政治局內部委員之間的協商機制（Dittmer, 2001: 53-67; 趙建民、劉松福，2007：53-86）。因此，江主政期間，中國的內部政治與決策過程逐漸展現出制度化的趨勢與發展。中國第三次權力循環中的分權過程，分別展現在經貿與外交兩個面向。在經濟上，逐漸偏離統制經濟。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理念作為中國國家發展的方針：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

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楊德山，2001）。這三項概念落實於經濟政策上，著重於社會化與現代化的任務，將私營企業主、個體戶、專業人員都吸納到共產黨內，消除資本家與工農階級之間的對立，推廣全民生活福利（傅岳邦，2003：7-30）。由此可知，古典共產主義所強調的統制經濟，在鄧小平南巡至江澤民時期，並沒有在中國真正地實踐，取而代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融入。

而江澤民時期的中國外交，也逐漸偏向國際建制的體系。江在1997年與2002年兩次到美國訪問，與時任美國總統柯林頓在會後發表了1997年的《中美聯合聲明》，認同雙方有廣泛的共同利益，並且致力於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未註明）。2001年美國遭遇到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對於全球地緣政治與美國外交政策產生重大的轉變，當時美國總統小布希和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打擊極端恐怖主義與國家安全上有共同的利益，兩國同時加強情報分享與溝通合作，促進世界和平與穩定。中美兩國在反恐上的合作與聯繫，降低了兩國在意識形態的對抗。此外，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進出口貿易量也大幅提升，中國逐漸融入國際建制，特別是世界經貿體系（朱新民、譚偉恩，2005：1-48）。

2002年，胡錦濤接替江澤民成為中共總書記，延續集體領導與協商的政治體制，因此胡主政初期延續黨內法規的各項職權，第三次週期中的權力分散也持續到胡錦濤主政期間。在經濟上，偏離統制經濟的路線持續進行，根據《人民日報》相關報導，胡錦濤在2003年提出「科學發展觀」的思想，堅持所謂「以人為本」，為中國未來創造平等、永續的發展。這項理念落實於對外經貿政策上，著重於提高中國對外開放的水準，充分利用國內與國外市場，吸引更多外國資本與技術提升國內產業結構，並且同時賦予中國企業境外經營管理上更大的自主權。

在外交政策方面，胡錦濤時期的中國繼續偏向國際建制體系。胡重申中國必須走向「和平發展」的道路，試圖消除亞洲周邊國家與歐

美國家對中國威脅論的疑慮（Medeiros, 2009: 250-256）。同時，中國政府在2000年初回應美國期望，展現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姿態，參與國際事務（Hoo, 2018: 95-129）。中國政府在2003年積極促成由中國、北韓、日本、南韓、俄羅斯六國共同參與的「六方會談」，解決朝鮮半島核子武器擴散與核試驗的問題（楊國強，2005）。與此同時，胡錦濤在2009年開始與美國定期展開「中美經濟戰略對話」，雙方高層代表討論雙邊與全球的安全與經濟議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3）。這一系列的外交與區域安全倡議，皆顯示出中國共產黨在2000年初期與美國的對抗趨緩，運用多邊談判的協商手段，促成東北亞穩定的秩序。

伍、第三次循環週期下的習近平「新政」

意識形態在中共體制的影響力一直沒有真正消去，江澤民與胡錦濤等科技官僚只是暫時冷卻意識形態的爭論。然而，保守派與改革派知識分子對於中國如何發展社會主義道路，以及經濟發展與對外開放之間的平衡，始終存在著「姓資」或「姓社」的左右之爭（陳宜中，2024：4-29）。這些意識形態上的辯論，也深刻影響了中國共產黨權力收放的循環。胡錦濤主政末期，中國內部掀起了「社資」兩條不同路線的辯論，在經歷了快速經濟發展之後，中國社會內部面臨了所得分配不均的矛盾，中央與地方政府需要滿足人民在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的基本需求（胡錦濤，2010）。關於經濟與社會發展政策的路線鬥爭，促成胡錦濤在2012年開始進一步收緊政治權力，強調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與西方資本主義對抗的本質，例如，胡在十八大全國代表會議中指出，「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絕不照搬西方制度模式」。

從表1可知，自習近平上任後，開始了第三次循環當中的集權過程（圖2③→④）。2013年，習近平更進一步加強對於國家安全

的維護與言論自由的控制，對於中國社會發表了「七不講」政策，即普世價值不要講、新聞自由不要講、公民社會不要講、公民權利不要講、中共的歷史錯誤不要講、權貴資產階級不要講、司法獨立不要講（Buckley, 2013）。在歷經江胡時期的分權後，保守政策重新成為中共的主要執政路線，而習近平將政治權力集中於一身，建立了所謂「習核心」的地位（Buckley, 2016）。與此同時，習近平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將自身的地位提升到與毛澤東一般，並且要求官員背誦學習這項社會主義理論。當然，這個「習近平現象」的解釋，或許與習自身的個性或理念有關，但本文試圖提出另一個觀點，即共黨政權的發展或許鑲嵌在歷史與結構的循環過程中，就像圖 1 所描繪的現象，中共與蘇共的發展路徑有高度的相似性。在歷經改革開放約 30 年的發展後，隨著中國國力上升，習近平似乎與布里茲涅夫一樣，再度將中國的發展帶向統制經濟及外交上的偏離國際建制，這也使得習時期的中國出現了類似布里茲涅夫的「停滯時期」。

首先，習近平與布里茲涅夫在經濟政策上都有強化統制經濟的色彩，然布里茲涅夫並沒有進行結構上的改革，而是力求穩定社會秩序，改善既有計畫經濟的效率（Feygin, 2024: 49-71）；習近平的中國則對於企業主進行了更多的政治管控。雖然中國的官方立場仍宣稱歡迎跨國公司和外國資本到中國投資事業，但中共積極干預國內市場與企業經營策略，堅持公有制在整體經濟發展中的地位（Davis, 2013）。2022 年，中國政府接管了安邦集團的保險業務、接管了企業家馬雲所經營的螞蟻金融服務事業，皆顯示了習近平主政時期並不積極鼓勵國內公司的業務擴展或提供法規條例保障消費者，反而是扼殺了私人企業創新的動力（Cai, 2022: 85-107）。

其次，在外交政策上，習近平則偏離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建制，這使得中國的外交政策出現了更為強硬的立場。習近平所推行的的大國外交與中華民族復興，促成了中國官員和發言人在公開場合上的強勢激動發言，例如所謂「捍衛中國利益與尊嚴」；世界各國

媒體也以「戰狼外交」一詞形容此現象（Wong & Deng, 2020; Gan, 2022）。例如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面對西方國家對中國政府處理新疆與香港問題的批評時，公開宣稱官員代表們要具有「戰鬥精神」（Hille, 2020）。馬丁（Peter Martin）在他的專書中指出，戰狼外交的對象是中國國內群眾，乃為激起人民愛國情懷與榮譽感。然而，近年來這些強硬的言詞和在南海軍事擴張的活動，引起了亞洲與歐洲國家人民對中國的反感。中國外交官的言行與黨中央主導的大外宣與意識形態控制相關，在習近平所主導的強勢外交原則下，外交官員們也需要積極表現出捍衛國家利益的立場（Martin, 2021: 366-373）。簡言之，從 2013 年開始，中國在對外政策上越趨侵略性，逐漸脫離鄧小平主席時期「韜光養晦、不要稱霸」的理念，並且在國際事務上積極地「有所作為」，展現出強國的風範，間接挑戰西方的國際建制。新冠肺炎（COVID-19）流行期間是中國強勢外交的高峰期，外交部發言人與駐外代表皆積極反駁 COVID-19 源自於中國本土，並強調中國疫情治理模式優於西方各國。然而，此種強勢的外交風格近年來已經逐漸趨緩（Jost, 2024）。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布里茲涅夫的蘇聯。1968 年，蘇聯鎮壓捷克斯洛伐克的抗議活動並入侵該國；1979 年，蘇聯出兵阿富汗，但是戰況膠著，俄軍陷入進退兩難困境（Hyland, 1979: 51）。在 1970 年代，蘇聯的戰略核武數量和美國保持相同水準，但是這樣長久的武器競賽導致在布里茲涅夫時期蘇聯軍事預算大幅提升，成為當時世界上軍事開支最大的國家（陸南泉，2001：64-73）。此時蘇聯的整體經濟也經歷了重要轉變，冷戰高峰時期的軍事對抗大幅壓縮了基礎建設預算，並導致經濟成長速度大幅下降。

對於習近平來說，無論是戰狼外交或經濟國有化等政策，都需要集中政治權力來完成。我們可以看到，中共在習時期成立了許多由習主導的領導小組，負責重要議題的分析與決策，弱化了政治局常委們的權力（黃信豪，2023：5-46）。雖然這項制度設計強化習個人在政

治、外交領域上的主導權，但是在經濟發展的軌跡上，卻陷入改革停滯的困境。

陸、結論：重新檢視習近平的停滯時代

為何習近平會回到毛左的集權路線？為何習主政下的中國，在外交上呈現出對西方抗衡，在經濟上則重新擁抱社會主義與強化國有制的政策？許多文獻注意到習近平的個性與理念，並以「總加速師」來稱之。當然，這個詞彙並不一定是指習近平加速中國的政經發展，而更多的意涵是暗諷習近平的執政加速了中共政治體制的集權與經濟下滑（盧永山，2024）。圖 1 顯示，習近平與布里茲涅夫一樣，幾乎都取消前朝的改革，導致經濟發展的遲鈍及對外關係的緊張。布里茲涅夫的「停滯時期」，似乎也出現在現今的中國。為了實踐在經濟上走向統制經濟與偏離美國領導的國際建制，這兩位領導人都透過政治集權的手段來貫徹。

所以，「習近平現象」真的只能以習的人格特質來解釋嗎？個性是一個微觀的解釋項，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們似乎不應該忽視政治與歷史結構的宏觀條件，這或許可以稱之為結構因素。本文指出，共黨體制意識形態與西方自由主義的不相容，使得共黨政權與西方國家之間難以有效融合。這點和其他威權國家的特性有所不同，諸如南美等地的威權政體，其雖然欠缺自由民主的體制，但這些國家與美國等西方大國仍可以和平共存。從這個角度來看，本文同意吳玉山提出的，「要喚回學界對於比較共黨研究的重視」（吳玉山，2021：14）。

在結構因素的制約，本文認為習近平在 2012 年之後的執政，可能是第三次收放循環過程中的「收權」階段。在共黨中國的政治基因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始終存在，無論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或 2001 年的「入世」，都僅是策略性地防止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對於治國的影

響，但這些思維仍存在於中共體制與領導人的思想。事實上，這 30 年的改革開放，左右之爭與「姓資」或「姓社」的質疑一直存在於中共黨人內部。習近平的毛左路線，似乎不應該僅將之解釋為受到習人格特質的影響，實則，它有更為宏觀且深遠的結構背景與歷史因素。即便非習近平主政，現今的中國發展路線是否就一定不會走向「再毛化」，這或許有值得討論的空間。

一個更有趣的討論是後習時期的政治發展。以蘇聯為例，在歷經布里茲涅夫停滯時期後，戈巴契夫提出「新思維」路線。戈巴契夫重新走向開放政策與政治分權，並進行了一連串改革，推行黨內民主化，改變一黨專政的體制。這一系列的做法也促成東歐國家脫離蘇聯體制，蘇聯共產黨解體，並在 1991 年結束冷戰對峙（蒙克，2019）。後習時期的中國是否會出現類似戈巴契夫的人物？中國是否會走向第四階段來重新擁抱改革與外交低盪政策？而中國在第三次權力收放循環之後，又是否會像蘇聯一樣最終走向消亡？本文試圖對於共黨政權的政經發展提出規律性解釋，但社會現象的繁複性是否如我們的論點與觀察，則需要學界進一步探討。

收件：2025 年 2 月 12 日

修正：2025 年 9 月 4 日

採用：2025 年 9 月 22 日

參考文獻

- 丁篤本（1999）。蘇聯政體與官制史。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Ting, D. B. (1999).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Political System and Official System*.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3）。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框架下經濟對話聯合成果情況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7月12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1207_680540/201307/t20130712_9361626.shtm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3). Diwulun zhongmei zhanlue yu jingji duihua kuangjia xia jingji duihua lianhe chengguo qingkuang shuoming.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uly 12.]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未註明）。江澤民主席訪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檢索日期 2025 年 11 月 3 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wjs_674919/2159_674923/200011/t20001107_10251009.shtm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d.). President Jiang Zemin's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trieved November 3, 2025.]
- 王駿（2020）。「文革」後期周恩來提出開創「特區」的設想。人民網，11月6日。https://zhouenlai.people.com.cn/BIG5/n1/2020/1106/c409117-31921599.html [Wang, J. (2020). Zhou Enlai's Proposal to Create 'Special Zones' in the Late 'Cultural Revolution.' *People's Daily Online*, November 6.]
- 任劍濤（2012）。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宿命。二十一世紀，

- (133), 頁 13-29。[Jen, C. T. (2012). The Fate of Reform in Socialist Countries. *Twenty-First Century*, (133), pp. 13-29.]
- 朱蓓蕾 (2000)。中國大陸的制度轉型與社會變遷面臨之問題。遠景季刊, 1 (3), 頁 79-111。[Chu, P. L. (2000).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Changes in Mainland China. *Prospect Quarterly*, 1 (3), pp. 79-111.]
- 朱新民、譚偉恩 (2005)。中國改革開放之政策評析：經濟、政治的改革與外交政策的調整及挑戰。東亞研究, 36 (1), 頁 1-48。[Chu, X. M. & Tan, W. E. (2005). Comment on Reform and Open Door Policy of Chin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form & the Adjusting and Challenge of Foreign Policy. *East Asian Studies*, 36 (1), pp. 1-48.]
- 吳玉山 (1996)。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蘇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正中書局。[Wu, Y. S. (1996). *Away from Socialism: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Mainland China, the Soviet Union, and Poland*. Zhengzhong Bookstore.]
- 吳玉山 (2003)。探入中國大陸經改策略之研究：一個比較的途徑。中國大陸研究, 46 (3), 頁 1-30。[Wu, Y. S. (2003). Mainland China's Economic Reform Strategy: A Comparative Approach. *Mainland China Studies*, 46 (3), pp. 1-30.]
- 吳玉山 (2021)。從比較共產主義看中共百年。政治學報, (71), 頁 1-31。[Wu, Y. S. (2021). Centennial of the CCP: A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Communism.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1), pp. 1-31.]
- 吳玉山 (2023)。習近平現象。載於吳玉山、寇健文、王信賢 (編), 一個人或一個時代：習近平執政十週年的檢視 (頁 4)。五南圖書。[Wu, Y. S. (2023). The Xi Jinping Phenomenon. In Wu, Y. S., Kou, C. W., & Wang, H. H. (Eds.), *One Man or an Era:*

- A Review of Xi Jinping's Ten Years in Power* (p. 4). Wunan Books.]
- 李福鐘（2022）。黨的路線與權力鬥爭：回顧毛澤東以來中共重大路線鬥爭。遠景基金會季刊，23（1），頁45-93。[Lee, F. C. (2022). The Party Line and Power Struggles: A Retrospection of the Major Line Struggles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ince the Maoist Era. *Prospect Quarterly*, 23 (1), pp. 45-93.]
- 李強（2012）。鄧小平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央視網，5月19日。https://big5.cctv.com/gate/big5/news.cntv.cn/china/20120519/106252.shtml [Li, Q. (2010). Deng Xiaoping and the Fight Against Bourgeois Liberalization. *CCTV*, May 19.]
- 邱奕宏（2021）。從國際建制主義解析川普挑戰全球貿易建制的�原因。遠景基金會季刊，22（1），頁127-184。[Chiou, Y. H. (2021). Analyzing the Causes of Trump's Challenges to Global Trading Reg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Regime. *Prospect Quarterly*, 22 (1), pp. 127-184.]
- 段春義（2018）。從新中國成立時的外交三原則看毛澤東的國際戰略思想。中共中央黨史與文獻研究院，1月22日。https://www.dswxyjy.org.cn/BIG5/n1/2019/0228/c423718-30948702.html [Duan, C. Y. (2018). Mao Zedong's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ree Diplomatic Principles at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Central Party History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 January 22.]
- 胡錦濤（2010）。胡錦濤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3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共產黨員網，9月6日。https://www.12371.cn/2012/12/13/ARTI1355384250319396.shtml [Hu, J. T. (2010). Hu Jintao's Speech at the 3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Gongchan Dangyuan Wang*, September 6.]

- 袁 易 (2018)。敢為天下先：跨境電子商務國際規則之中國倡議。《展望與探索月刊》，16 (5)，頁 62-75。[Yuan, I. (2018). Dare to Go First: China's Initiative on Formulating International Rules for Cross-border E-Commerce. *Prospect & Exploration*, 16 (5), pp. 62-75.]
- 高 屹 (2013)。鄧小平新時期的外交戰略思想述論。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9月6日。https://www.dswxyjy.org.cn/BIG5/n1/2019/0228/c423964-30915122.html [Gao, Y. (2013). Deng Xiaoping's Diplomatic Strategic Thought in the New Era. *Central Party History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 September 6.]
- 高 朗 (2006)。如何理解中國崛起？。《遠景基金會季刊》，7 (2)，頁 53-94。[Kao, L. (2006). How to Perceive the Rise of China?. *Prospect Quarterly*, 7 (2), pp. 53-94.]
- 夏春濤 (2014)。鄧小平對外開放與防止「西化」辯證思想的意義及啓示。《東岳論叢》，2014 (6)，頁 23-29。[Xia, C. T. (2014). Dengxiaoping duiwai kaifang yu fangzhi 'xihua' bianzheng sixiang de yiyi ji qishi. *Dongyue Tribune*, 2014 (6), pp. 23-29.]
- 秦 華 (2011)。毛澤東在建國後的國際戰略思想及其實踐效應——《毛澤東在建國後的國際戰略思想及其實踐效應》成果簡介。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12月26日。http://www.nopss.gov.cn/BIG5/219506/219508/219510/16719501.html [Qin, H. (2011). Mao Zedong's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Thought and Its Practical Effect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Mao Zedong's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Thought and Its Practical Effect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National Office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ecember 26.]
- 傅岳邦 (2003)。中共「三個代表」的制度分析：新制度論的觀點。《展望與探索月刊》，1 (2)，頁 7-30。[Fu, Y. P. (2003).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the CCP's 'Three Represents': A Neo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 *Prospect & Exploration*, 1 (2), pp. 7-30.]

許明（2002）。蘇共：一個大黨衰落的啓示。河南人民出版社。
[Hsu, M. (2002). *The CPSU: Lessons from the Decline of a Great Party*. He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陳宜中（2024）。六四的幽靈——也談鄧小平路線。當代中國研究通訊，（36），頁 4-29。[Chen, I. C. (2024). The Ghost of June Fourth — Also on the Deng Xiaoping Line. *Contemporary China Newsletter*, (36), pp. 4-29.]

陸南泉（2001）。蘇聯走近衰亡的勃列日涅夫時期。東歐中亞研究，（6），頁 64-73。[Lu, N. C. (2001). The Brezhnev Era: The Soviet Union's Approach to Decline. *Ea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Studies*, (6), pp. 64-73.]

寇健文（2007）。中共與蘇共高層政治的演變：軌跡、動力與影響。載於徐斯儉、吳玉山（編），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頁 93-141）。五南圖書。[Kou, C. W. (2007). The Evolution of High-Level Politics in the CCP and CPSU: Trajectory, Dynamics, and Impact. In Hsu, S. C. & Wu, Y. S. (E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arty-State: Elites and Policies of the CCP Regime* (pp. 93-141). Wunan Books.]

寇健文（2010）。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10。五南圖書。[Kou, C. W. (2010). *The Evolution of CCP Elite Politics: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ower Transfer 1978-2010*. Wunan Books.]

張神根（2022）。中國共產黨人建立新中國的宣言書：《新民主主義論》。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8月23日。<https://www.dswwxyjy.org.cn/BIG5/n1/2022/0823/c427167-32509126.html>

[Chang, S. G. (2022). The Manifesto of Chinese Communists to Build a New China: 'On New Democracy.' *Central Party History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 August 23.]

陶儀芬（2007）。政治權力交替與經濟機會主義：集體行動與改革時期中國政治經濟景氣循環。載於徐斯儉、吳玉山（編），*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頁 177-210）。五南圖書。[Tao, Y. F. (2007). Political Power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Opportunism: Collective Action and China's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in the Reform Era. In Hsu, S. C. & Wu, Y. S. (E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arty-State: Elites and Policies of the CCP Regime* (pp. 177-210). Wunan Books.]

黃信豪（2023）。習近平時期高層領導小組的發展：中共游擊式政策風格。遠景基金會季刊，24（1），頁 5-46。[Huang, H. H. (2023). High-level Leading Small Groups in the Xi Era: The CCP's Guerrilla Policy Styles. *Prospect Quarterly*, 24 (1), pp. 5-46.]

華思齊（2021）。鄧小平提「兩個轉變」扭轉外交戰略 聚焦改革開放。當代中國，11月18日。<https://www.ourchinastory.com/zh/2866/%E9%84%A7%E5%B0%8F%E5%B9%B3%E6%8F%90%E3%80%8C%E5%85%A9%E5%80%8B%E8%BD%89%E8%AE%8A%E3%80%8D%E6%89%AD%E8%BD%89%E5%A4%96%E4%BA%A4%E6%88%B0%E7%95%A5> [Hua, S. Q. (2021). Deng Xiaoping's 'Two Transformations' Shifted Diplomatic Strategy to Focus on Reform and Opening Up. *Our China Story*, November 18.]

楊國強（2005）。胡錦濤會見賴斯：雙方就中美關係、台灣問題、六方會談等交換意見。中國青年報，3月21日。https://zqb.cyol.com/content/2005-03/21/content_1052794.htm [Yang, G. Q.

- (2005). Hu Jintao met with Rice: The Two Sides Exchanged Views on China-U.S. Relations, the Taiwan Issue, the Six-Party Talks, and Other Topics. *China Youth Daily*, March 21.]
- 楊勝群（2019）。鄧小平提出「三步走」發展戰略。人民網，3月7日。https://cpc.people.com.cn/BIG5/n1/2019/0307/c69113-30961722.html [Yang, S. Q. (2019). Deng Xiaoping Proposed the 'Three-Step' Development Strategy. *People's Daily Online*, March 7.]
- 楊德山（2001）。三個代表。中國共產黨新聞，7月1日。https://cpc.people.com.cn/BIG5/64162/64171/4527680.html [Yang, D. S. (2001). Three Represents. *CPC News*, July 1.]
- 鄧小平（1994）。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二版）。人民出版社。[Deng, X. P. (1994).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Volume II)* (2nd ed.).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鄧小平（2009）。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Deng, X. P. (2009).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Volume II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蒙克（2019）。中國圖謀取代美國霸權或重蹈勃列日涅夫的覆轍。BBC 中文網，11月14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0423205 [Monk (2019). China's Plan to Replace U.S. Hegemony May Repeat Brezhnev's Mistakes. *BBC Chinese*, November 14.]
- 趙建民、劉松福（2007）。改革開放以來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及決策體制之變遷。遠景基金會季刊，8（1），頁53-86。[Chao, C. M. & Liu, S. F. (2007). Changes of CCP Top Decision-making System in the Reform Years. *Prospect Quarterly*, 8 (1), pp. 53-86.]
- 蔣永清（2015）。略論鄧小平與中國對外開放大格局的初步形成。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12月16日。https://www.dswxyjy.

- org.cn/BIG5/n1/2019/0228/c423964-30930046.html [Chiang, Y. C. (2015). A Brief Discussion on Deng Xiaoping and the Initial Formation of China's Grand Pattern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Central Party History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 December 16.]
- 鄭易平 (2016)。蘇聯政治體制及崩潰。秀威資訊。[Cheng, I. P. (2016). *The Soviet Political System and Its Collapse*. Showwe Information.]
- 盧永山 (2024)。中國已進入「歷史的垃圾時間」，評論家：習「總加速師」居首功。自由時報，2月4日。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4572313 [Lu, Y. S. (2024). China Has Entered 'the Garbage Time of History,' Commentator: Xi 'Chief Accelerator' Takes the Credit. *The Liberty Times*, February 4.]
- 羅平漢 (2020)。新民主主義是如何提出來的。學習公社數字圖書館，11月3日。https://library.ttc dw.com/libary/zhengzhililunsuyang/ddls/2020-11-03/167108.html [Luo, P. H. (2020). How New Democracy Was Proposed. *Xuexi Gongshe Shuzi Tushuguan*, November 3.]
- Bernstein, T. P. & Li, H. Y. (2010). *China Learns from the Soviet Union, 1949–Present*. Lexington Books.
- Buckley, C. (2013). China Warns Officials against 'Dangerous' Western Values.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3. https://www.nytimes.com/2013/05/14/world/asia/chinese-leaders-warn-of-dangerous-western-values.html
- Buckley, C. (2016). Xi Jinping Assuming New Status as China's 'Core' Leader.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4. https://www.nytimes.com/2016/02/05/world/asia/china-president-xi-jinping-core.html
- Cai, X. (2022). The Weakness of Xi Jinping: How Hubris and Paranoia

- Threaten China's Future. *Foreign Affairs*, 101 (5), pp. 85-107.
- Chen, F. (1995).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Post-Mao China: Ideology and Reform*.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Chen, F. (1999). An Unfinished Battle in China: The Leftist Criticism of the Reform and the Third Thought Emancip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58), pp. 447-467.
- Cleveland, W. S., Grosse, E., & Shyu, W. M. (2017). Local Regression Models. In Chambers, J. M. & Hastie, T. J. (Eds.), *Statistical Models in S* (pp. 309-376). Routledge.
- Davis, B. (2013). Beijing Endorses Market Role in Economy: Economists Express Doubts After Release of Reform Pla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12. <https://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4644104579193202337104802>
- Dittmer, L. (2001). The Changing Shape of Elite Power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45), pp. 53-67.
- Fewsmith, J. (1994).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 Routledge.
- Fewsmith, J. (2021). Balances, Norms and Institutions: Why Elite Politics in the CCP Have Not Institutionalized. *The China Quarterly*, (248), pp. 265-282.
- Feygin, Y. (2024). Choosing Stagnation: The Kosygin Reforms and the Rise of Brezhnev's Stagnationary Coalition. *Europe-Asia Studies*, 76 (1), pp. 49-71.
- Foot, R. & King, A. (2020). China's World View in the Xi Jinping Era: Where Do Japan, Russia and the USA fit?.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3 (2), pp. 210-227.
- Gan, N. (2022). China's Xi Attempts to Claim Diplomatic Victory

- in Battle for Global Influence After Summit Whirlwind. *CNN*, November 21. <https://edition.cnn.com/2022/11/21/china/china-xi-diplomatic-victory-intl-hnk>
- Gijbels, I. & Prosdocimi, I. (2010). Loess. *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2 (5), pp. 590-599.
- Goldstein, S. M. (2001). Dialogue of the Deaf?. In Ross, R. S. & Jiang, C. B. (Eds.), *Re-examining the Cold War: U.S.-China Diplomacy, 1954-1973* (pp. 200-237).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Hille, K. (2020). ‘Wolf Warrior’ Diplomats Reveal China’s Ambitions. *Financial Times*, May 12. <https://www.ft.com/content/7d500105-4349-4721-b4f5-179de6a58f08>
- Hoo, T. B. (2018). *China’s Global Identity: Consider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Great Power*.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Hyland, W. G. (1979). Brezhnev and Beyond. *Foreign Affairs*, 58 (1), pp. 51-66.
- Janos, A. C. (1996). What Was Communism: A Retrospective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9 (1), pp. 1-24.
- Jia, Q. (2005). Learning to Live with the Hegemon: Evolution of China’s Policy toward the U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4 (44), pp. 395-407.
- Jost, T. (2024). Have China’s Wolf Warriors Gone Extinct?: Why Beijing Embraced Combative Diplomacy—and Why It Might Do So Again. *Foreign Affairs*, June 27.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have-chinas-wolf-warriors-gone-extinct>
- Jowitt, K. (1975). Inclusion and Mobilization in European Leninist Regimes. *World Politics*, 28 (1), pp. 69-96.
- Keohane, R. O. (2005).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ornai, J. (1992).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rasner, S. D. (1983). *International Regim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ee, T. C. (2018). Can Xi Jinping be the Next Mao Zedong? Using the Big Five Model to Study Political Leadership.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3), pp. 473-497.
- Legro, J. W. (2007). What China Will Want: The Future Intentions of A Rising Power.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5 (3), pp. 515-534.
- Li, J. (2018). The 1990s Chinese Debates Concerning the Causes fo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mong PRC Soviet-watchers: The Cases of Brezhnev and Stal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9 (2), pp. 163-199.
- Linz, J. J. (2000).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Martin, P. (2021). *China's Civilian Army: The Making of Wolf Warrior Diplom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edeiros, E. S. (2009). Is Beijing Ready for Global Leadership?. *Current History*, 108 (719), pp. 250-256.
- Minzner, C. (2018). *End of An Era: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Revival Is Undermining Its Ri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tter, R. (2024). Open or Closed? China's Dilemmas In A Changing 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 Order.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40 (2), pp. 366-373.
- O'Donnell, G. (2023).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Argentina 1966-1973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uggie, J. G. (1993).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churmann, F. (2022).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Vol. 3)*.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hambaugh, D. (2005).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9 (3), pp. 64-99.
- Shirk, S. L. (1993).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Vol. 2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nidal, D. (1985). 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9 (4), pp. 579-614.
- Svolik, M. W. (2012). *The Politics of Authoritarian Ru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origian, J. (2018). Historical Legacies and Leaders' Worldviews: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and Xi's Learned (and Unlearned) Lessons. *China Perspectives*, (1-2), pp. 7-15.
- Torigian, J. (2022). Xi Jinping and Ideology. In Myers, L. (Ed.), *2021-22 Wilson China Fellowship: Essays on China and US Policy* (pp. 307-338). The Wilson Center.
- Tsai, W. H. & Wang, Z. (2024). Centralizing Rules: How Party Regulations Are Reinforcing Cadre Loyalty in Today's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92), pp. 27-45.
- Wang, J. (2019). Xi Jinping's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A Paradigm Shif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8 (115), pp. 15-30.
- Wintrobe, R. (199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ictatorship*.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ong, C. H. & Deng, C. (2020). China's 'Wolf Warrior' Diplomats Are Ready to Fight: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Has Adopted An Aggressive New Stance, Spurred by Beijing's Push to Increase Its Global Influenc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19.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s-wolf-warrior-diplomats-are-ready-to->

fight-11589896722

Zheng, B. (2005).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
Foreign Affairs, 84 (5), pp. 18-24.

附錄一

《真理報》的相關數據

年份	黨內民主	集體領導	總次數	年份	黨內民主	集體領導	總次數
1950	13	2	15	1971	25	22	47
1951	2	0	2	1972	10	10	20
1952	51	4	55	1973	11	7	18
1953	23	33	56	1974	6	7	13
1954	7	20	27	1975	12	7	19
1955	10	17	27	1976	18	30	48
1956	51	93	144	1977	10	9	19
1957	17	35	52	1978	15	6	21
1958	10	15	25	1979	13	7	20
1959	15	25	40	1980	8	6	14
1960	6	8	14	1981	10	10	20
1961	57	83	140	1982	1	12	13
1962	8	16	24	1983	19	9	28
1963	3	20	23	1984	11	10	21
1964	10	31	41	1985	23	12	35
1965	13	30	43	1986	16	16	32
1966	52	39	91	1987	23	8	31
1967	18	14	32	1988	50	11	61
1968	23	8	31	1989	68	22	90
1969	17	14	31	1990	93	12	105
1970	17	10	27	1991	11	3	14

附錄二

《人民日報》的相關數據

年份	黨內民主	集體領導	總次數	年份	黨內民主	集體領導	總次數
1950	26	26	52	1988	32	19	51
1951	8	16	24	1989	26	37	63
1952	29	13	42	1990	20	26	46
1953	30	48	78	1991	19	28	47
1954	44	125	169	1992	15	29	44
1955	17	65	82	1993	10	25	35
1956	62	158	220	1994	15	34	49
1957	32	113	145	1995	18	28	46
1958	5	49	54	1996	15	27	42
1959	17	53	70	1997	27	36	63
1960	3	63	66	1998	19	34	53
1961	28	38	66	1999	23	48	71
1962	6	22	28	2000	17	39	56
1963	5	27	32	2001	51	63	114
1964	7	40	47	2002	61	62	123
1965	8	21	29	2003	43	52	95
1966	7	36	43	2004	109	47	156
1967	6	18	24	2005	82	25	107
1968	4	22	26	2006	92	30	122
1969	4	63	67	2007	99	48	147
1970	2	19	21	2008	80	28	108
1971	11	75	86	2009	107	23	130

年份	黨內民主	集體領導	總次數	年份	黨內民主	集體領導	總次數
1972	3	53	56	2010	105	21	126
1973	8	45	53	2011	82	31	113
1974	2	17	19	2012	155	39	194
1975	2	19	21	2013	56	20	76
1976	2	7	9	2014	43	30	73
1977	32	31	63	2015	20	33	53
1978	45	33	78	2016	60	52	112
1979	68	63	131	2017	63	15	78
1980	58	89	147	2018	16	13	29
1981	37	65	102	2019	17	27	44
1982	30	61	91	2020	19	12	31
1983	24	49	73	2021	28	12	40
1984	14	29	43	2022	32	11	43
1985	14	23	37	2023	8	6	14
1986	17	27	44	2024	6	2	8
1987	46	42	88				

Xi Jinping's Governance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System's Cycle of Power Concentration/Decentralization

Christina J.Y. Lai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Wen-hsuan Tsai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Under Xi's leadership, why has China taken a confrontational stance toward the West in foreign affairs, while simultaneously adopting socialist economic policies and promot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with that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and it proposes a cyclical model of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within communist regimes. It argues that ideological struggles inherent to communist systems create constant tensions between conservative and reformist factions within the party. When the conservative line prevails, the party tends to pursue a command economy and distance itself from international regimes. To implement such policies, top leaders often consolidate political power. However, when these policies lead to a decline in national capabilities or economic stagnation, political reform becomes necessary. In such phases, leaders tend to adopt decentralization policies and re-engage with international regimes to stimulate more reforms. Xi's current

trajectory resembles that of the Brezhnev era, characterized by a phase of strong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This work offers a structural explanation grounded in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communist regimes to account for China's turn toward "re-Maoization" under Xi's leadership.

Keywords: Comparative Communism, Power Centralization, Command Economy, International Regimes, Authoritarianism